K295.1
X68a4

SHANGHAI TONGSHI WANQING SHEHUI

上海通史

熊月之 / 主 编

第5卷

晚清社会

周 武 吴桂龙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A0909476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开埠前后的上海社会

1843年11月，上海依约开埠，从此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成为五口通商时代最活跃的条约口岸。

就上海社会演变而言，1843年开埠通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上海社会开始逸出传统的轨道，并逐渐向近代化国际性大都市迈进。随着租界的划定，上海城北的荒僻之地开始了近乎魔幻般的变迁。于是，上海的版图上出现了截然不同、彼此分立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旧有的繁庶县城，一个是新辟的租界社区。由此，上海形成了一个城市、两个世界的奇特格局。

一　“东南都会”

清嘉庆《上海县志》中有这样一段话摹写当时的上海：“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经过宋元明清数百年的发展，到嘉庆年间，上海已是一座相当繁庶的县城了。“沿浦闹市，北至洋泾浜口，南至薛家浜口，商旅猬集。沙船航海之业，有朱姓及郁姓、王

姓、孙姓等富豪,世宗大族,有曹、陆、徐、乔诸氏。"[1]县城内有街巷63条[2],城内及附近居民二十余万[3],钱庄几十家,商肆店铺鳞次栉比,县城傍浦的大小东门外近廓之处更是热闹繁华。"言居民,则五方杂处,行帮汇集;言通商,则四处辐辏,水陆毕陈",乾隆中叶以后,"上海县城已完完全全成为当时上海地区的经济中心所在"[4],远非昔日的滨海渔村可比了。

开埠之前的上海确乎已是一个特点鲜明的城市。《法华乡志》称:"上海一隅,本海疆瓯脱之地。有元之时,国家备海寇,始立县治于浦滨,斥卤方升,规模粗具。自明至让清之初,均无所表见。时市肆盛于南城,城之北,荒烟蔓草,青冢白杨,其农户烟村多散处于西、南二境。"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部分开放海区,准许海上贸易,上海才逐渐摆脱清初的"海禁严切,四民失调"的困境,走向复苏。1729年(雍正七年)海禁完全解除,海区大开,上海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机遇。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上海在周边地区的地位日益突出。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当时上海在行政上虽仍隶属于松江府,但雍正以后,向驻太仓、苏州,比府衙更高一级的地方军政机关,苏松太兵备道衙门移驻上海,这无疑表明海禁解除后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上海的政治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作为一个象征,苏松太兵备道的移驻上海,说明上海已成为一个区域的政治中心。嘉道年间上海人曹晟在其所著《觉梦录》中,称当时的上海县城"不更出于松城之上乎! 自海禁既开,民生日盛,生计日繁,金山银穴,区区草县,名震天下"。这段话大体反映了开埠前夕上海政治、经济发展的实况及其在区域中的地位。

有关开埠前上海社会演进的情况,在本书《古代上海》卷中已有具体描述,此处不赘。下面着重讨论开埠前上海社会中与晚清社会密切关联的一些特质。

“以 港 兴 市”

上海的崛起肇始于海上贸易的发展，上海的衰落亦起因于上海港的衰落。有学者这样描述上海的发展与上海港之间的关系：“上海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与上海港的发展有着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密切的关系。上海是一个典型的港口城市，它的兴起肇始于海上贸易，以后的兴衰也取决于港口的兴衰。连同城市的扩展和布局莫不与港口的变化有关。因此，可以说上海港的发展也是上海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5]

上海地区内最早的海上贸易港是青龙镇，它位于吴淞江南岸，距海不远，东下可以出海，西上可至苏州，东南经顾会浦抵达华亭县城，西南由大盈浦经淀山湖、运河到秀州（今嘉兴市），它连江通海的优越地理条件，使它成为太湖流域理想的出海口岸。它兴起于唐代中期，至两宋之间盛极一时，据《绍熙云间志》记载，宋元丰年间，青龙镇的海上贸易已十分发达，“岛夷、闽、粤、交、广之途所自出，风樯浪舶，朝夕上下，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所会”，成为“海商辐辏之所”。但此后由于海口东移，吴淞江湮塞，青龙港逐渐丧失贸易港口之利，趋于衰落，终废于明末。在青龙镇的衰落过程中，上海港却在悄然崛起。上海位于吴淞江下游南岸，地理位置比青龙镇更近海，且有上海浦为港湾，是一个理想的良港。基于海上贸易的需要，南宋咸淳初年建镇，行政隶属华亭县，并设市舶务。南宋末年，上海已是“海舶辐辏，商贩积聚”之区，并开始取得贸易港口的地位了。

上海港口地位的提升，刺激了上海镇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日益显示出超越周边市镇的态势。据邑人唐时措《建县治记》称，在建县治之前，上海已“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宫、仙馆、甿廛、贾肆，鳞次而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到 1291 年（至元二十八

年),因“华亭地大,民众难理”[6],松江知府仆散翰文遂表请设县,经朝廷批准,割华亭县东北五乡,置上海县,设县治于镇。

从镇到县,是上海经济发展,特别是作为贸易口岸发展的结果。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吴淞江河道的淤浅,上海港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的制约,一直未能达到宋代青龙镇那样发达的局面。虽然从元初开始曾经过多次的疏浚,但效果均不太明显。位于上海西北、长江南岸的太仓、浏河逐渐成为太湖地区出海的主要航道,浏家港因此而成为长江口的主要港口。江南各地的漕粮都集中于浏家港出海北运,一时之间,北上的漕运船艘与外商的船舶云集,浏家港于是兴盛和繁荣起来,成为江南地区“番汉间处,闽广杂居”的新兴贸易口岸,有“六国码头”之誉。明宣德年间郑和多次出海远航,就是从浏家港启航的。与浏家港的盛况相比,那时上海的港口贸易几乎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上海港的发展转机出现于明永乐年间。1403 年(永乐元年),户部尚书夏元吉抵达上海,治理吴淞江、黄浦江流域的水患,疏浚黄浦江成功,从此巨舰可直驶上海城下,上海港作为江南地区主要出海口的地位由此奠定,上海亦因此而获得了再度发展的机缘,到明弘治年间,上海已是相当发达的工商城市了。尽管如此,有明一代上海的港口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对外贸易及海运始终未成为上海城市经济的主流,原因在于“国朝以来,法令严明,沿海通番之家悉皆诛窜,从此良民无敢私自出海”[7]。“促成上海经济不断成长的是以新兴手工棉纺织业为基础,以内河海运为主要交通手段的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国内贸易的兴起。”[8]

明清易代之后,清政府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曾厉行海禁,“片板不准入海”,不仅商船,甚至连渔船也严禁出海。由于“海禁严切,四民失利,故往时所号为大富室者,今多萧然悬罄矣”。直到 1685 年解除海禁,并于翌年在江、浙、闽、粤设四海关后,上海港才又重现宋元时代那样繁忙的景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作为清代四海关之一的江海关所在地，上海县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清政府规定江海关“通商行驶闽省商船，名曰鸟船，熟于浙台洋面，不入北洋，来江俱收上海口子”[9]。因此，清前期上海的海运贸易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对闽广等地的南洋航线的贸易，北洋航线的贸易仍归浏家港统辖，北航沙船若泊上海则被视为非法之举，这一规定无疑大大地制约了上海港口贸易的发展规模。但解除海禁仍为上海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上海县城大小东门外即宋元时代顺济庙、市舶司署一带在经历了漫长的沉寂之后又重新繁盛起来。康熙时邑人姚延遴在《历年记》中说：“元朝市舶司原设于上洋，收海商之税，即今之海关也。康熙二十年（应为二十四年）仍设海关于上海，至今十五年矣。洋货及闽广货物俱在上海发客，小东门外竟为大码头，此又市面之一变也。”到乾隆年间，出入于上海港的商船更是“辐辏而云集”，据乾隆《上海县志》称，“自海关设立，凡远近贸迁皆由吴淞口进泊黄浦。城东门外舳舻相接，帆樯比栉”。时人叶梦珠在《阅世编》中也说：“往来海舶俱入黄浦编号，海外百货俱集。”各种记载大同小异，它们都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此时上海的航运贸易规模已相当可观了。

从乾隆初年起，兴盛一时的浏家港因受海潮的长期顶托，港口外形成一条绵延十余里的拦门沙，严重影响船舶的进出，逐渐走向衰落。来往于奉天、山东洋面之沙船几乎全部泊收上海，上海遂获鼎盛发展之机。到嘉道年间，上海港在南门外的南码头、周家渡及大小东门外的黄浦江沿岸已形成颇具规模的港区码头。据估计，开埠前夕，上海港的沿海航运船只总数可达4000艘以上，航运总吨位可达42万吨左右，出现了“舳舻尾衔，帆樯栉比”的繁盛景象。1832年东印度公司职员胡夏米侦察了上海港区后，在向公司递交的报告中说：宽敞的码头和巨大的货栈占据了江岸，泊岸的水深足能使帆船靠岸和沿码头卸货。码头上货物卸装上下，昼夜不绝，万商辏聚，百货山集，

人马喧闹,舟车如织。据胡夏米统计,仅他在吴淞口观察的7天内,经吴淞口入上海港的100到400吨的船只就达400艘以上,其中多数是来自天津、东北各地的北方四桅沙船,所载货物多为面粉和大豆,自福建、台湾、广东、东印度群岛、交趾支那和暹罗来的每天也有三四十艘[10]。上海已成为中国南北之间、沿海和腹地之间交换各种商货的最大商港,江南地区的商业贸易中心。道光年间上海的一位地方官说:"上海号称小广东,洋货聚集。稍西为乍浦,亦洋船码头,不如上海繁富。浏河亦相距不远,向通海口,今则淤塞过半。"[11]惟上海"适介南北之中,最为冲要,故贸易兴旺,非他处所能埒。"[12]当时以上海港为中心已形成了五条固定的航线:北洋航线(通燕赵、齐鲁之地,具体分上海至牛庄、至天津、至芝罘三条航线),南洋航线(往返于上海与浙江、福建、台湾、两广之间),长江航线(上海与汉口之间的沿江各岸),内河航线(利用江南水系及大运河与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各县镇之间的贸易),国外航线(主要是华侨商船往返于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家地区之间)。

上海从兴起之日起,走的就是"以港兴市"之路。到开埠前夕,上海已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沿海贸易型城市。港兴则上海兴,港衰则上海亦衰。"以港兴市"和"万商云集"给上海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航运业特别是内河航运业成了上海的一大支柱产业,上海的许多豪富均以航运业起家,出现了不少"一家有海舶大小数十艘"的豪族和来自本地、宝山、崇明、南汇等地的在船水手十余万。其次是由于近海,又是以国内外贸易起家,上海一直与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长期生活在这样的时空中的上海人见多识广,眼界开阔,较易形成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在上海的发展历程中,上海从来不想囿闭自己,上海始终是敞开自己的大门,在开放中实现开发,又在开发中迎来更大的开放,并在更大的开放中带来更进一步的开发。"[13]由开放带动开发,这确实是上海与江南其他府县特别是内地的府县最

大不同之所在。

“五 方 杂 处”

与“以港兴市”相对应，前近代上海社会已是一个“五方杂处”之所了。时人称：“上邑濒海之区，南通闽粤，北达辽左，商贾云集，帆樯如织，素号五方杂处。”[14]

由于上海是个贸易口岸，因此从一开始就同各地商贾结下不解之缘，各地客商往来如梭。南宋末年，上海已是“海舶辐辏，商贩积聚”之所。到了明代，随着上海城市商品经济的活跃与发展，行商迁徙、人口流动更趋频繁，许多商人携重资来沪经商，所谓海艘辐辏、万商云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在有明一代来沪经商的客商中，以徽商、秦晋商人（又称山陕商人）最为活跃，亦有来自江北、湖广、浙江、苏南及闽广等地的客商。徽商主要从事棉布贩运，上海地区各市镇中的布商相当部分皆为徽人，也有以贩运盐和木竹为业者。除此之外，在高利贷、典当业及店铺商人中，徽商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秦晋商人也多以贩运棉布为主，将上海地区的棉布贩运到齐鲁赵魏之地出售，清人叶梦珠追述，明代后期的秦晋富商来上海地区贩布，有携白银多达数十万两者，他们往往成为上海布行商人争相接纳的对象。这些来自各地的商帮携巨资而来，人数众多，地缘构成复杂，经营范围遍及各行各业，占据上海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本帮商人反而退居次要的地位。明嘉靖时人郑开阳说：“苏松富饶之乡，货物辐辏……其开张字号行铺者，率皆四方旅寓之人，而非有田者也。”[15]说的就是外籍商帮反客为主的现象。由此可见，当时外籍商帮在上海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明清易代之后，特别是1685年解除海禁后，上海的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各地商帮更如潮水般涌入上海，上海几成客籍商帮

争逐的天下。张春华在《沪城岁时衢歌》中说:上海县城"居民本多商贩寄籍","黄浦之利商贾主之,而土著之为商贾者不过十之二三"。除了先前最显赫的徽商和秦晋商人仍然在众多行业活动外,在来沪的客籍商帮中,洞庭商帮、浙江宁绍帮、关山东帮、江北帮以及闽广帮、江西帮等地方商帮的势力日益壮大,乾隆以后,这些客籍商帮大有驾徽商、秦晋商人而上之势。洞庭商帮多开行铺,其中不少人落籍定居。浙帮商人以浙东宁波、绍兴居多。绍帮以经营炭栈、钱庄、酒坊为主,1831 年(道光十一年)浙绍公所创建之初,有名有姓的捐资者多达 209 人。宁帮经营范围更广,举凡海船运输、南北货贩运、钱庄、银楼、糖业、绸缎业、棉布、药材、海鲜、咸货业,无不有他们活跃的身影,于是宁帮商人成为上海继徽商、秦晋商人之后最有势力的客籍商帮。关山东帮分关东商人和山东商人,两者均以商业贩运为主业。关东商人在清初颇有势力,曾在上海县城西集资购田设置关山东公所义冢,但很快便寂寂无闻了。山东商人又分西帮、胶帮、登帮、文莱帮和诸城帮,合称北五帮商人。与关东商人不同,他们在乾隆以后却日渐兴盛,到道光前期,北五帮商号至少有 24 家之多。江北帮商人指的是海门、通州一带的船商及海州赣榆县的青口商人。江北船商开埠前夕仅次于本帮沙船主,通州、海门两帮各有数百号商船,常年聚于上海,或自载商货,或为客商载运。青口商人主要从事贩运业。闽广商人可分泉漳帮、潮州帮、建汀帮、揭普丰帮和潮惠帮等帮口,是海通以后随着沿海埠际贸易的兴盛而崛起的一股重要的商业势力,主要从事海船运输和南北货贩运,其中以泉漳帮的势力最大。江西商人在上海起步较晚,人数不多,主要从事贩运业,即将江西内地的茶叶、瓷器、棕、苎麻等贩至上海,然后再贩棉布及杂货回内地。除了这些商帮外,开埠前上海地区的客籍商贾还有来自汉口、江宁、镇江、无锡等地的商人。据统计,清前期上海县城内外设立的会馆公所就达 27 家之多。这些同乡或同业组织的大量设立,显示出客籍商帮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

上海的群体力量。

随着商业贸易的繁盛，江南各地豪富右族亦纷纷移居沪城，“右族以侈靡争雄长，燕穷水陆，宇尽雕楼，臧获多至千指，甚者厮养舆服或至凌辖士类”[16]。当然也有一些是避难而来，譬如宋元易代之际，一批亡宋遗民或不愿出仕元朝的士大夫就把上海作为自己的退身隐居之地，其著者如王逢、杨维桢、庄肃等。元末各地义军纷起，江南板荡，而上海却“素无草动之虞”，因而成为避难的理想之所，邻郡居民纷纷避入沪上。时人何良俊说：“吾松人物之盛亦有自也，盖由苏州为张士诚所据，浙西皆为战场，而吾松稍僻，峰泖之间以及海上皆可避兵，故四方名流荟萃于此。”[17]他们的到来，无疑促进和推动了上海文化的发展，提升了市民文化生活的品位。到清道光年间，上海已有“文秀之区”和“海滨邹鲁”之誉。

在上海客籍居民中，除了有正当的职业者外，还有大批来自国内各地的流民，其中尤以闽广籍游民为最。到开埠前后，城内的游民问题已相当严重，他们“游手好闲，各分党翼”，“纠合豪棍，开场聚赌，窝顿外来鼠窃，夜出穿窬，营兵结连为利薮”。后来更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毁官署，肆行抢掠”的地步。参与暴乱者中有“江苏省大江以南之棚民，大江以北之捻匪，也有上海之闽广游民及周游各处之粮船水手、贩盐枭徒”[18]。1846 年江苏巡抚李星沅奏报：江苏“沿江滨海，水陆交冲，五方杂处，匪徒最易托足，如上海之闽广游民，苏松常镇之土匪棚民，淮扬徐之捻匪盐枭与跟随漕船之水手青皮，以船为家之渔户流丐，防范稍疏，每虞滋事”[19]。可见闽广游民问题已十分突出。

商帮、豪富右族、避难名流及闽广游民，共同造成了开埠前后上海“坊巷客土杂居”之局，有些文献甚至称上海城内“居民多客籍”。这种“五方杂处”、“客土杂居”的格局，一方面使前近代上海社会具有很强的兼容性，极易养成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前近代上海社会的多元性格，给上海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力。这种社

会格局在前近代社会中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特质。

商业性都会

前近代上海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商业性。与政治性城市或军事性城市不同,上海是一个商业性城市,商业在上海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居于最重要的地位。上海的兴起肇端于商业贸易,上海的繁盛亦由于商业贸易。商业贸易一直是这个城市经济的命脉所在,也是这个城市社会演进的最主要的一种推力。

早在宋元时期,上海的商业贸易就已兴起。元至元二十八年上海置县之时,县治所在的上海镇已是"华亭东北一巨镇","有市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宫、仙馆、甿廛、贾肆,鳞次而栉比"。当时上海口岸的商业贸易已相当繁盛,进出上海口岸的不仅有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诸国和国内闽广等地的贸易商船,而且有本地的海商船队。后人称:"元朝禁网疏阔,江南数郡顽民率皆私造大船,出海交通琉球、日本、满剌、交趾诸蕃,往来贸易,悉由上海出人,地方赖以富饶……彼时地方之人,半是海洋贩易之辈。"[20]此后上海港历经变迁,到清康熙年间解除海禁,设立江海关,上海以棉布贸易为基础的沿海航运业遂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商业贸易大致可分为地区内部的贸易、国内贸易(包括转口贸易)和对外贸易。从这三个层次看开埠前夕上海商业贸易会获得比较明晰的印象。

就地区内部的贸易而言,宋元以来,上海的商品经济已相当发达,区域内部的贸易非常频繁。到明清时期,区域小市场更为发展,出现了一些富有特色的专门化商品产地,如"绒纹绣出上海下沙镇,谓之下沙绣;蒲鞋,出东门三里汀者佳;银器制作极精;铜器,府城、上海皆有之,功致精好,非苏产比;细木器、梳具、交椅之类,出下沙镇;

屏风、酒桌、香几之类出泖滨，皆极精致；草席、芦席并出上海”[21]。当时上海的集市贸易和铺肆买卖，流通和交换的多是农民剩余的农产品和家庭副业及小手工业者生产的各种手工业品。而上海地区内部的贸易主要表现为西米东运和东棉西运。

就国内贸易而言，上海向国内大市场输出的最主要商品是棉布。植棉业和棉纺织业在上海地区自宋元时期就已有所发展，到明中叶更得到迅猛的发展，“松江之民多倚织布为生”，其生产能力和产量远远超出了生产者自身的需要，超出了地方市场所能容纳的程度，也超出了直接折征纳赋的需要。超出就得寻找市场，就得进入国内大市场。上海产的棉布以其优良的质地赢得了市场，北至九边、山陕、京师，南到江广、滇黔、闽粤，遍及全国各地，故有“衣被天下”之誉。明末上海名士陈继儒在《布税议》一文中曾描述过当时的盛况：“凡数千里外装重资而来贩布者曰标商，领各商之货布者曰庄户。乡人转售于庄，庄转售于标。其沂淮而北走齐鲁之郊，仰给京师，达于九边，以清源为绾毂；出长江之口，径楚蜀而散于闽、粤、秦、晋、滇、黔诸郡国，以芜关为绾毂，是皆孔道要津。布商麇集，舟车负载，昼夜驰骛而不息，此天下之大命脉也。”[22]可见上海国内贸易之盛！尽管入清以后，南北各地除上海外又出现了不少产布区，使上海的棉布在国内市场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总体上仍然处于上升的趋势，上海棉布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依然首屈一指。与棉布的输出相对应，棉花的输出在上海商业贸易中亦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主要销往闽广及苏南浙西等地。道光后期曾有外国人这样评价：“棉花即使不是上海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也是上海国内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23]

就转口贸易而言，在清前期特别是乾隆年间以后，上海借助口岸的地理位置和运输条件迅速成为“当时的中国南北之间，沿海和腹地之间商品流通和交换的枢纽和大商埠”[24]。腹地省份从海路向国内大市场输出商品，沿海省份向内地输出商品，往往都需从上海过境。

当时从东北贩运到江南各地的豆,大部分即经上海口岸转口分销,道光年间上海《饼豆业建神尺堂碑》云:"上海为阜通货贿之区,其最饶者莫如豆。由沙船运诸辽左、山东,江南北之民,倚以生活。磨之为油,压之为饼,屑之为菽乳,用宏而利薄,率取给于上海。"[25]上海转口贸易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国内贸易和转口贸易之外,开埠之前上海的对外贸易亦有所发展,并形成一定规模。即使在"片板不许入海"的"海禁"时期,上海的海上贸易也未完全停止,每年到日本各港行商的船只仍有四十多艘(其中不乏"海盗船"),它们带去了不少中国"南京省"的商品。这些商品包括:"书籍、白丝、绫子、纱绫、绉绸、绫纰、罗、纱、纸、闪缎、南京缎子、锦、南京绡、金缎、五丝、柳条、袜褐、捻线绸、金线棉布、绡绌、棉布、斜纹棉布、丝棉、皮棉布、丝线、纸、信纸、墨、笔、扇子、箔、砚石、线香、针、栉篦、香袋、人造花、茶、茶瓶、瓷器、铸器、锡器、镶嵌金银的刀护手、漆器[堆朱(螺细)、青贝描金、朱漆、屈轮、沈金]、光明朱、绿青、明矾、绿矾、红豆、芡实、槟榔子、檀香、芍药、黄精、何首乌、白术、石斛、甘草、海螵蛸、紫金锭、腊药、花石、纸制偶人、角制工艺品、革制文卷匣(俗称拜匣)、刺绣、书画、古董、化妆品及化妆用具、药种。"[26]这些商品中绝大部分并非上海及江浙地区所产,显系转运商品。嘉庆年间,上海县城东门外已有专事洋货买卖的商行,所聚集之地称洋行街。当时的上海已有"小广东"之称,"洋行聚集,有洋商四家半",县城外的黄浦江已为洋货驳船停泊之所。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国的银洋在上海亦日渐流通,甚至出现了"以洋来者为贵"的崇洋风气,所谓"世俗物用都以自洋来者为贵,无论物产何地,美其名则加一洋字示珍也。更可笑者,贵游豪侈,一切奢丽生色,亦争艳之为洋气云"。[27]

国内外贸易之盛又刺激和推动了上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上海及邻近地区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棉花种植地和棉纺织品的生产基地。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已指出上海地区"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

万亩，大半种棉”。上海县志中说“种稻之处十仅一二，而木棉居其七八”，“生计全在于棉”。据17世纪来沪的外国传教士统计，上海及附近的专业织工达20万人。康熙任命的苏州织造李煦奏：“上海县，民间于秋成之后，家家纺织，赖此营生。”“家家纺织”当然不是仅仅满足自家及本地区的需要，而是为满足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就是说，上海人绝大部分必须依靠市场生存，全邑数十万人皆仰商贾为生。明中叶上海人陆楫说：“自吾海邑言之：吾邑僻处海滨，四方之舟不一经其地，谚号为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颇易为生尔。”[28]说当时上海县城游贾数十万人，当然不足信。但据此亦可知，上海县城所聚外地商贾的数量已非常可观。开海禁后，上海的埠际贸易更有空前的发展，到开埠前夕，上海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商业性都会了。



图1-1　老城厢内的商业街

靠市场生存的上海人当然知道商业的价值，在上海的开发历程中，始终洋溢着一股崇商风气。一位初到上海的英国人一下子就捉

中,上海商民的心理和民风日渐趋向奢靡。据《云间杂识》记载:宋元之时,上海地区就出现了"以豪奢相尚"的风气,所谓"僻处海上,称乐土,富民以豪奢相尚,衣服、宫室、用度,往往逾制"。海禁之后,上海这个通洋商埠陷入困顿,原有的豪气一扫而光,与此相适应,上海的习俗"一变而为俭朴"。开海禁后,上海又重现生机,沉寂多时的黄浦江又分外热闹起来,一时帆樯如林,货物如山,商民如云。早期《申报》回忆开埠前的情景说"沙、卫各船之装卸货物者,皆泊于南市,故自董家渡至十六铺一带,百肆喧闹,万物充牣"。夜晚,县城东南沿江地带更是灯红酒绿,一派豪奢之气。时人施润在一首竹枝词中写道:"一城烟火半东南,粉壁红楼树色参。美酒羹殽常夜五,华灯歌舞最春三。"[29]出现这样的盛况,原因在于:"沙船之利亦倍蓰于往日,故当时以沙船为恒产者,蒸蒸日上,获利无算,有富至百十万者。"[30]海上贸易的繁盛,使上海成为一个聚宝盆,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财富都流了进来。

以港兴市、五方杂处及商业性,构成了前近代上海社会的三大特质。这三大特质彼此相连,相互为用,共同造就了前近代上海社会多元、兼容的内在属性。到开埠前夕,上海"已初步形成为开拓性的经济活动,杂糅式的文化生活,外向的经济类型和开放的城市属性"[31]。长期生存于这种社会空间中的上海人,无疑较易于接受环境的变迁,其对新的情势的适应性自然亦较大,明显有别于内地人或沿海其他城市居民。对于这一点,有些学者曾作过比较专门的剖析,他们认为,较之生活在内地的同胞,长期以海上贸易为重要活动的上海人明显地"具有海洋性民族的性格特征"[32],并在上海的开发历程中形成了一种外向性与开放的心态,这种性格和心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善于从事海上贸易。上海人以港兴市,海上贸易和航运业一向是他们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支柱之一。初设县时,"地方人士半

是海洋贸易之辈”,这话未必百分之百精确,但至少说明当时从事海洋贸易的上海人不在少数。《清史稿》曾把“海洋贸易之辈”有意识地划分为“富者”和“贫者”:“富者为船主、为商人,贫者为舵工、为水手。”早期《申报》亦曾刊载上海老人回忆开埠前的海洋贸易之事:“一二富商大贾集股凑赀,相与为漂洋生意,制坚船、挟瑰宝,涔濬而外,不知纪极。或十余年而归,或数十年而归,或且人船俱失,无一得归。归则获利数倍、数十倍。”赚大钱、发大财的利欲驱使上海人远涉重洋、走向世界。不过开埠之前,上海人的这类豪举并不多见。他们的活动多在沿海一带,从事南北洋海上贸易,或驾沙船往日本及东南亚诸国贸易经商。

其次是民风比较犷悍。从总体上说,上海地区的民风自宋室南迁以后由尚武向崇文转变,但不同地域仍有较大区别,上海县由于居民多从事海上贸易,民风依然强悍。县志上说“至宋益号犷悍难治”,“东乡之民(上海在松江府东面,称“东乡”)恃其离县辽远,辄与官吏相抗,威令不行,殴役毁文,毫无忌惮。甚至巡尉会合,亦敢聚众持械以相抗拒”,至于“濒海奸民,弄兵萑苇”则是上海地区由来已久的“匪情”。在这种民风的淬沥之下,习武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不用说海盗或防海盗者,就是一般沙船上的舵工和水手也大多练就一身好武艺,有的甚至会特别的武功。这些沙船上的舵工、水手以习武为纽带,形成一种相当特殊的关系。他们往往亲如兄弟,安危与共,他们的抱成一团常使船长和伙长恼火,却又无可奈何。传教士郭实腊曾把自己亲眼所见变成文字,其中有一段写到沙船船长与水手们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船上的伙长“名义上指挥全船的水手,但水手们只在合乎自己心意时才听从他”,“实际上,水手们控制着全船。任何措施只要它们危及自身的利益,即加以反对。即使是船长和伙长,受不了他们的蛮横行为时,也常常不得不请他们协助,求他们别发脾气”。这可能是相当极端的例子,但舵工、水手中确乎很少安分之辈。

王韬在《瀛壖杂志》中称“海滨之民气质刚劲,举止率卤”,说的就是上海人的性格。

再次是敢于破除成习、取他人之长。开埠之前的上海就是一个通洋商埠,五方杂处,“海外百货俱集”,生活于这样空间中的上海人显然比内陆居民要见多识广,乐于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和经济来往,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善取他人之长的传统。远如棉花和植棉技术的引进以及黄道婆对棉纺织工具和技术的改进,近如徐光启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介绍与传播,都足以说明这一点。

综上所述,前近代上海无疑已是一个个性鲜明且相当富庶的“东南都会”了。尽管受历史条件以及制度环境的制约,上海所聚集的城市人口、城垣的规制、城廓的面积以及城市地位都远不如江南的苏州、杭州和宁波,同东南沿海直接与西方商人贸易的闽广厦门、广州相比,也不免相形见绌,但自康熙年间设立江海关以来,沿海贸易迅速发展,上海作为国内贸易港口和商业都会的地位已获得空前的跃升。张忠民曾在《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一书的最后说:“从大量的中外史料记载来看,近代前夕的上海县城,已南连闽广以至东南亚各国,北接关外、津沽、山东、两淮,背靠广阔的江南、华中、华南腹地,不仅已是江南地区最重要的贸易海口,而且业已成为整个长江流域广大腹地的门户,南北洋沿海贸易以及沿海、腹地贸易的唯一枢纽和汇聚中心。”

上海社会的特质以及开放外向型的上海人心态,不仅是前近代上海社会演进的强大动力,而且为尔后的上海发展培植了必不可少的内在基因。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开埠之初来华的洋人在广州和上海两个通商口岸会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上海在五口通商时代会异军突起,迅速取代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